

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综述及反思

周群英 贾丁华*

【摘要】伴随着儿童观念的变迁,家庭教养方式也出现转型。本文立足于社会学学科,从阶层、性别、流动三个视角回顾与梳理国内外家庭教养方式文献,期望为家庭教养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双减”政策和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适时出台,势必对我国家庭教养实践产生深远影响,但也需警惕可能带来的意外性后果,如扩大校外教育的不平等。

【关键词】家庭教养方式 阶层视角 性别视角 流动视角

DOI:10.16775/j.cnki.10-1285/d.2022.06.008

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lippe Ariès)指出,从中世纪到21世纪,儿童观念经历了从“消失的儿童”到“有用儿童”和“无价儿童”的历程^①。中世纪西方社会缺失儿童观念,儿童被视为“小大人”。工业革命时期儿童获得工作的机会,经济价值得到提升,生产“有用儿童”。20世纪“神圣儿童”的理念使儿童的经济价值弱化,情感价值得到强化。

伴随着儿童观念的变迁,家庭教养方式也出现转型,以孩子为中心的“情感型家庭”教养模式开始从资产阶级家庭向底层家庭蔓延^②。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中,教育竞争愈加激烈。为了让子女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父母不惜花重金购置学区房,带着孩子辗转于各类夏令营、兴趣班等游学活动,各阶层家庭不同程度卷入“育儿战争”中,“直升机父母”逐渐兴起,“密集型育儿”趋之若鹜,社会弥漫着前所未有的“育儿焦虑”。

一、家庭教养方式的内涵与类型

家庭教养方式(Child-rearing style)是指父母通过养育行为传递给儿童、并由儿童感知到的家长态度和情感氛围^③,通常由教养信念、目标、风格和实践所组成^④。早期西方学界对教养方式的研究经历了从学校到家庭场域的变迁,17世纪英国教育学家洛克(John Locke)提出著名的“白板说”,主张鼓励孩子从实践经验中获取知识。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推崇“自然教育”的思想,倡导学校要根据孩子的自然天性进行教育,不需过多的干涉,奉行“归于自然”的教育思想。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主张家庭是儿童教育的初始单位,强调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20世纪以来,心理学的发展有力推动了家庭教育研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

* 周群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贾丁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智库选题“双减政策下家长焦虑的社会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高响应 教养方式	低响应 教养方式
干预孩子的选择 (密集型教养方式)	权威型	专断型
不干预 孩子的选择	放任型	忽视型

图1 家庭教养类型

来源:《爱、孩子和金钱:育儿经济学》,2004年版

精神分析理论、华生(John B. Watson)的行为主义理论以及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对家庭教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们认识到儿童早期的生活经历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开始从心理层面与家庭互动的角度探讨教养方式。

1965年,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根据家长对孩子的控制程度将教养方式区分为权威型(Authoritative)、专制型(Authoritarian)和宽容型(Permissive)三种类型。之后,麦考比(E. E. Maccoby)和马丁(J. A. Martin)提出了修改版本,他们基于要求性(Demandingness)和反应性(responsiveness)两个维度,将教养方式划分为高响应、高要求的权威型(Authoritative);低响应、高要求的专制型(Authoritarian);高响应、低要求的放任型(Indulgent)和低响应、低要求的忽视型(Neglectful)四种教养方式类型(见图1),这一划分方法取代了鲍姆林德“宽容型”的单一分类,丰富了教养方式类型学的研究。在维度学中,美国学者西蒙兹(Percival M. Symonds)按照“接受-拒绝”“支配-服从”两个维度,划分教养方式。被父母接受的孩子,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情绪稳定、与人为善、富有同理心;被父母拒绝的孩子,更容易情绪不稳定、逆反心理严重;由父母支配的孩子更倾向于表现为缺乏自信心、懦弱顺从;让父母服从自己的孩子有很强的攻击性^⑤。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从个体心理与亲子互动的角度划分和阐释家庭教养的模式具有积极理论

和实践意义,然而却普遍忽略了社会文化背景、阶层分化对家庭教养的影响。

社会学视角的家庭教养研究逐渐弥补了这一缺陷。社会学家们认为,家庭教养方式存在阶层分化,带有阶层色彩的教养方式会影响孩子的社会性发展、学业成绩与未来成就^⑥。本文立足于社会学学科梳理当代家庭教养方式,从阶层、性别与流动视角回顾家庭教养方式的国内外文献,聚焦“双减”政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对我国家庭教养方式进行综述和反思。

二、阶层视角:阶层再生产与“不平等的童年”

阶层视角认为,不同阶层与社会地位的家庭通常会采用风格多样的教养方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犀利地指出,教育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等级的工具,在教育的过程中,后一代能够继承带有阶级品味的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这种体现优势阶级追求的资本已经成为实现社会阶级再生产的工具^⑥。

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聚焦家庭教养的阶层差异。在《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中,她将家庭教养方式划分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与“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两种模式^⑦。“协作培养”是指父母双方以协作的方式培养孩子的天赋、才能和主见,在日常生活中为孩子精心安排各种夏令营、兴趣班等游学活动,促使孩子成为精英。“成就自然成长”则是指父母双方允许孩子自由成长,由孩子自主安排课余时间,父母往往只承担培养孩子品格养成的角色。研究发现,中产阶层家庭普遍采用“协作培养”的教养方式,而工贫阶层家庭普遍遵循“成就自然成长”的教养模式,两者在日常生活的组织安排、亲子互动、语言技能的培

养、与公共机构的互动等方面显现出明显的差异。进而,拉鲁指出,公共机构偏好“协作培养”的教养方式,它们与中产家庭共享同一套教养文化。工人阶层孩子的优势无法被转化为成人机构认同,他们日常生活内在的价值观或者在家里使用指令性语言,并不能转化成未来的职场优势。组织结构运转的具体方式,造成了把优势传递给中产家庭孩子这一结果。制度上的不平等演变为逐渐深化的代际间不平等。两种带有不同“阶层烙印”的教养方式嵌入到整个社会结构之中,造成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鸿沟,社会阶层在此过程中成功实现再生产。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关注“反学校文化”基础上工人阶级家庭子承父业的问题。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中,他指出,工人阶级家庭子承父业是工人子弟主动选择的结果。通过家庭教养,工人阶级子弟将渗入到工人阶级家庭毛细血管的车间文化(Work Shop culture)内化于心,他们较早地洞察(Penetration)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教育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讲实质上是一纸空文,对于找到工作没有任何意义,并形成一种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与此同时,他们接受文化的限制(Limitation),认同体力、脑力分工和性别分工的合法性,将脑力劳动视为“娘娘腔”并嗤之以鼻,而将受剥削、受压迫的体力劳动视为男性气概的表现,因此他们竭力抵触学校灌输的知识体系,最终走上与父母相同命运的道路,“寒门难出贵子”,工之子恒为工,劳工阶层实现再生产^⑧。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关注美国为人父母之道的阶级分化。在《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一书中,他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现代社会令人怵目惊心的现实:日渐加深的经济鸿沟横亘在美国社会中间形成泾渭分明的居住隔离,由居住隔离带来的教养方式的分化筑起了一道森严的阶层壁垒^⑨。21世纪以来,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经济每况愈下,社区衰

败、家庭破碎、居住隔离等现象愈加严重^⑩,整个社会出现“两阶家庭结构”(Two-tier family structure):上层阶级的家庭结构稳定,父母双方掌握着丰富的优势资源,通过孩子将家庭的资源优势带入富人社区的学校,以慈爱、温暖与讲道理的教养方式培养独立、自主、有反思能力的下一代,而工人阶级家庭复杂且脆弱,家庭的失序使得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与家庭婚姻呈现脱钩的状态^⑪。总结来讲,居住隔离使整个社会出现“两阶家庭结构”,不同阶级出身的父母通过差异化的教养方式影响孩子的认知、社交及未来^⑫。家庭教养方式的分化带来了阶层壁垒,穷孩子从一出生就落于下风,拥有着根深蒂固的劣势与“不平等的童年”。

家庭教养方式与阶层分化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关联^⑬,带有鲜明“阶层烙印”的家庭教养方式嵌入到整个社会结构之中,造成社会阶层的巨大鸿沟,这种体现优势地位的家庭教养方式已成为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尽管现实中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性要比理论上的阶层二分法复杂得多,且社会阶层、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结果之间并不是专属化对应的,但是家庭教养方式作为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已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

三、性别视角:从母职教育到男性参与

性别主义视角关注男女两性在家庭教养中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受早期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模式建构的影响,男性大多将生活重心放在事业上,女性承担相夫教子的重任。因此,早期关于家庭教养方式的综述研究中,女性始终“在场”,着重强调女性在亲子互动、学业辅导、培养后代中发挥的作用,而男性往往“缺席”,忽视了男性在亲子教育中的正向影响。直到20世纪中叶,男性在家庭教养中不可忽视的功能逐渐被认识。

(一)母职教育理念与母职现象。汉娜·海

斯(Hannah Hays)最早提出“密集型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的概念。她概括了美国当代中产阶级对母职的要求:母亲需要在时间和精力上高度密集,在情感上高度投入,以孩子为中心,倾注巨大的经济成本并听从专家的指导^④。同时指出,在“密集型母职”教育理念的冲击下,职场女性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参与育儿的过程中存在自身时间精力的有限性与育儿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如何成为一名既有责任又无私奉献的母亲”成为困扰当代职场女性的重要问题之一^⑤。克里斯托弗(Karen Christopher)在“密集型母职”的基础上,提出“延展母职”(extensive mothering)概念,即母亲通过将日常生活中的育儿护理委托给他人(家政工或隔代抚养),构建“广泛母亲”的脚本来平衡工作与育儿时间和精力上的冲突^⑥。

国内学者对母职现象的研究,往往放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视域下,讨论城市母职与乡城迁移中的母职协商。陶艳兰关注城市女性对母职教育的认同与实践,受到传统性别意识、职场规则和科学育儿知识的影响,城市女性愈加认同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理念,在实践中通过建构“好妈妈”的身份,从“身体在场”与“心理在场”两方面满足孩子的多元需求^⑦。唐咏提出,目前城市中家庭母职实践逐渐走向公共领域,在较广的范围内女性呈现焦虑母职的形象,她们通过采取影子教育与干涉主义的态度协调社会资本为后代的发展提供助力^⑧。肖索未研究发现,乡城迁移中存在制度母职与实践母职之间的鸿沟,一方面,乡城迁移的家政工在行为上挑战主流的育儿理念,另一方面,她们自身又无法消解主流育儿理念的影响,同时经济供养和提供照料构成了迁移母职的教养方式,而经济供养是其主要组成^⑨。

陪读作为母职教育的外在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萌芽,90年代之后普

遍存在。郑燕娜通过对农村母亲陪读现象的研究提出,陪读作为一种过度干预子女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的人格特征及个性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在陪读过程中子女容易对家长产生依赖心理,造成“能力缺失症”,形成自我中心以及孤僻的人格特质,并对亲子互动产生逆反心理,不利于家庭教养^⑩。罗曼认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女性选择陪读是受到传统性别角色形塑的后果,女性陪读会影响家庭教养及亲子互动的有序进行,“单独陪读”的教养方式削弱了完整的家庭结构,使男性在育儿场域中长期缺席,核心角色的空位以及性别角色榜样的缺失使亲子互动潜藏危机^⑪。田北海发现,农村女性陪读的个体行动逻辑是基于家庭利他主义理念,其选择成为陪读大军的一员不是被动接受性别分工的结果,而是权衡家庭成员利益之后的理性行为。女性陪读具有相较于男性的比较优势,女性细腻的情感关爱、耐心的沟通能力会在陪读学生遭遇学业低谷期间起到精神抚慰的效果^⑫。

(二) 男性参与:积极功能和阶层分化。许多国外研究表明,男性参与育儿对儿童的心智成长、情绪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⑬。霍夫曼(Hoffman)和扬布莱德(Youngblade)通过调查369个父母梳理具有不同就业模式的家庭对孩子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父职程度高的家庭,孩子往往与好成绩、高智商、善于人际交往的标签挂钩,同时父亲会充当家庭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调解员角色^⑭。卡尔森(Carlson)指出,男性参与育儿能够鼓舞妻子全面成长,对婚姻起到良好的调适作用^⑮。迈耶(Meyer)指出,参与育儿的男性,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亦有参与育儿的父亲模范,即参与父职有世代循环的迹象^⑯。科恩(Melvin L. Kohn)和卡洛尔(Eleanor E. Carroll)通过调查发现,父亲参与育儿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分化明显。中产阶级家庭认为,男性有义务给予育儿支持,男性也会积极地融入到育儿过程中;工

贫家庭持有“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理念，家庭育儿的责任归于女性²⁷。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男性参与育儿的研究亦有很多。转型时期的父职经历了延续与变迁。对于未成年子女，父亲在日常生活照顾中普遍“缺席”，经济支持为其首要责任。积极为孩子提供日常照顾的关爱父职正在萌芽，但新旧父职话语相互收编。对于成年子女，父代责任强化且性别微调，权利减少²⁸。现代生育制度的发展使抚育行为从原有的家庭结构中脱嵌出来，国家、市场等系统使抚育行为重新纳入到法律化、科学化和专职化的抚育体制中，在脱嵌与重组的过程中，父亲在道义上、法律上、情感上都开始认识到参与家庭抚育工作的必要性²⁹。参与父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衡母职焦虑，缓解母子关系的紧张，然而现阶段父亲参与育儿还未形成常态，因此，参与父职在中国内地存在一定的阶层性与时代性³⁰。

从母职教育到男性参与反映了整个社会从结构论到实践论思潮的转变。现代社会，抚育行为从社会性别结构与家庭结构中脱嵌出来，教养的参与主体逐渐多元化，在脱嵌与重组的过程中个人的主体意识慢慢觉醒，父职参与的积极作用日益得到重视，虽然目前男性参与育儿带有一定的阶层色彩，但父职参与将是未来家庭教养的大势所趋。

四、流动视角：区隔与融合

流动视角关注社会流动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精英教育体系下，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剧，社会流动的阶梯产生断裂³¹。

美国学者劳伦·A·里维拉(Lauren A. Rivera)曾进入美国起薪最高的行业(投行、律所与咨询公司)对面试、选拔等招聘环节进行分析，在《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一书中指出，父母通过传递经济优

势、社会关系与文化资源，潜移默化地教育孩子在与守门人打交道时应遵循的剧本，使其在面试选拔等环节中展现出与面试官相契合的阶级品味，精英选拔的竞争已经成为精英自我复制与其他群体向上流动的壁垒³²。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reseovich)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指出，“美国的精英教育系统在不断繁衍美国的阶级系统”，精英学校高昂的教育费用将低收入家庭拒之门外，中产及以上的家庭在将孩子送往常春藤盟校的过程中投入巨大的经济成本，越过层层关卡。美国的精英高校成为名副其实的“特权堡垒”(Privilege Bastion)，在精英教育体系下，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剧，社会流动的阶梯产生断裂。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指出，家庭教养方式对孩子在教育、职业向上流动尤为重要，权威型教养方式已经成为孩子移动到教育金字塔顶端的强大助推剂，育儿差距的扩大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由此长期地阻碍社会流动³³。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认为，现代社会家庭不再通过购买职位来保持自身的特权地位，而是通过对文凭的投资、教育的重视来使孩子维持优势地位，文凭成为现代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³⁴。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一书中展现了其所成长的故乡克林顿港，在20世纪50年代教育、经济融合程度较高，社会交往的壁垒可以轻易打破，而在半个世纪后整个克林顿港的社区、学校、邻里阶级壁垒森严、区隔泾渭分明，特权家庭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将他们隔离在学校普遍优秀的中上阶层社区中，贫穷的孩子却因为机会的减少而受损。这一悲剧是美国全国范围内的阶级鸿沟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家庭教养方式、家庭结构变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向上流动也面临着和西方社会相似的命运。1978年之前，中

国的教育由极度的不平等状态向平等化方向演化；1978年之后，教育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增强。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教育从大众化向精英化的转型使城市高阶层家庭的孩子受益，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成为被淘汰的对象^⑤。同时，家庭资本影响儿童的教育获得和社会的向上流动。冯文（Vanessa Fong）指出，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落地后，面对教育分层、学历膨胀、精英岗位不足的现代市场竞争体系，父母往往采取高教育投入与高就业期望的策略以期为孩子向上流动提供助力^⑥。与享有优势特权的家庭不同，底层家庭出身的学生往往无法借助家庭的力量逾越人生发展的暗礁。二本院校的大学生笃定个人的努力，在碎片化与原子化的时代，他们将个人命运归结于个人的努力程度与运气造势，将个人与时代割裂开来，然而却又亲眼目睹整体层面的学生溃败于时代的洪流，遭遇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见证着逼仄的上升空间^⑦。


前工业社会，家庭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继承直接获得。在工业社会，中产阶级依靠教育成就敲开社会地位的大门。在后工业社会，阶层壁垒愈加森严，社会地位的继承与获得更加困难，中上阶层与底层之间的区隔泾渭分明。社会地位获得经历了“区隔-流动-区隔”的发展历程。家庭教养方式被视为阶层区隔壁垒形成的重要机制。

五、总结与反思

伴随着儿童观念的变迁，家庭教养方式出现转型。通过回顾文献得出：在阶层视角下，家庭教养方式与阶层分化之间呈现明显的关联，带有鲜明“阶层烙印”的家庭教养方式嵌入到整个社会结构之中，俨然会造成社会阶层的巨大鸿沟，这种体现优势地位的家庭教养方式已成为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在性别视角下，从母职教育到男性参与的教养方式反映了整个

社会从结构论到实践论思潮的转变。抚育行为在脱嵌与重组的过程中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父职参与的积极作用得到重视。在流动视角下，精英教育与工贫阶层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剧，社会流动的阶梯产生断裂。家庭教养方式被视为阶层区隔壁垒形成的重要机制。

文凭日益成为社会流动阶梯，社会普遍弥漫着育儿焦虑。为缓解这种焦虑，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双减”政策的出台对改善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推动素质教育全面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可能带来一个意外性的后果，即扩大校外教育的不平等^⑧。中上阶层与工人阶层拥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等资源禀赋存在显著的差异，课业负担的减轻让学生拥有更多的课余时间，精英阶层家庭的父母能够利用广大的人际网为子女链接教育资源开展校外教育，有效地利用增加的校外时间，而普通阶层的子女往往缺乏有效的渠道与机会，很难充分利用增加的校外自由时间进行校外教育。

概言之，“双减”政策出台后，课业负担的减轻让学生拥有更多的校外时间，优势群体能够发挥家庭资源禀赋的优势让子女充分接受校外教育，从而可能会导致校外教育中本就存在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适时出台，势必对我国家庭教养实践产生深远影响。这些举措的持续推进，引发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在“家校社”联动的大趋势下，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将扮演什么角色，父母与学校、社区又该如何联结。这些问题有待学界进一步商榷与讨论。

① [法]菲利普·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3-4页、199-200页。

② 周群英：《“家里外人”：家政工身份转换的人类学研究》，

-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 ③ Darling N,Steinberg L,"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An Integrative Model."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3,113(3)。
- ④ 徐慧,张建新,张梅玲:《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心理科学》2008第4期。
- ⑤ 罗伯特·S.林德,海伦·梅里尔·林德.米德尔敦著:《当代美国文化研究》,盛学文、马春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7-170页。
- ⑥ [法]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害》,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页。
- ⑦ [美]安妮特·拉鲁著:《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宋爽、张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 ⑧ [英]保罗·威利斯著,《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162页。
- ⑨ Robert D.Putnam, 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p.42。
- ⑩ 沈镇:《“寒门难出贵子”——读罗伯特·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
- ⑪ Robert D.Putnam, 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p.61-72。
- ⑫ [美]罗伯特·帕特南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田雷、宋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页。
- ⑬ 田丰、静永超:《工之子恒为工?——中国城市社会流动与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
- ⑭ 吴小英:《母职的悖论:从女性主义批判到中国母职策略》,《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 ⑮ Hays,S,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⑯ Christopher,K,"Extensive Mothering: Employed Mothers' Constructions of the Good Mother.",Gender & Society,2012,26(1)。
- ⑰ 陶艳兰:《世上只有妈妈好——当代城市女性的母职认同与实践》,《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6期。
- ⑱ 唐咏:《被建构的焦虑母职和参与父职:基于深圳中产阶级家庭教育的质性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 ⑲ 肖索未,汤超萍:《流动的母职:乡城迁移中的母职协商》,《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2期。
- ⑳ 郑燕娜:《农村母亲“陪读”现象的社会学解读》,《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8期。
- ㉑ 罗曼:《强化抑或禁锢——随迁型陪读现象的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 ㉒ 田北海、黄政:《陪读比较优势、家庭利他主义与农村陪读母亲的形成——基于L镇的实地调查》,《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 ㉓ Lewis, Charlie, and Michael E. Lamb,"Fathers' Influence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e Evidence from Two-Parent Families."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2003 (18)。
- ㉔ Hoffman,L.W.,&Youngblade,L.M.Mothers at work:Effects on children's well-be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㉕ Carlson,L. Fatherhood in the U.S.,"The Decoupling of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Family Profiles."FP- 20-14. Bowling Green,OH: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 Marriage Research,2020。
- ㉖ Meyer,J,"Restructuring the Christian Fatherhood Model:A practical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le problematic' of father absence."HTS:Theological Studies,2018,74(1)。
- ㉗ Melvin L.Kohn,Eleanor E.Carroll,"Social class and the allocation of parental responsibilities."Sociometry,1960 (4)。
- ㉘ 王向贤:《转型时期的父亲责任、权利与研究路径——国内父职社会学研究述评》,《青年研究》2019年第1期。
- ㉙ 王雨磊:《父职的脱嵌与再嵌:现代社会中的抚育关系与家庭伦理》,《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3期。
- ㉚ 同⑱。
- ㉛ [美]威廉·德雷谢维奇著,《优秀的绵羊》,林杰译,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
- ㉜ [美]劳伦·A·里韦拉著,江涛,李敏译,《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4-305页。
- ㉝ [美]马赛厄斯·德普克,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著,吴娴,鲁敏儿译,《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格致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页。
- ㉞ [美]兰德尔·柯林斯著,《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 ㉟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 ㊱ [美]冯文著,《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常姝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
- ㊲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17页。
- ㊳ 李路路,王元超:《“减负”与教育不平等的扩大——基于意外性后果的理论视角》,《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11期。

(责任编辑:杨婷)